

# 閒聊、閱讀和課題設計

• 鄭凡

那晚上我和朋友一個聊得深沉。背景是我和他一起參加了一個醫學與社會科學相結合的組織——雲南省生育健康研究會，隨後，在來頭不小的國際機構資助下，我們下鄉，發問卷，跟農民間聊，回城後就撰寫研究報告了。

我們的話題卻與生育健康的統計數據無關，聊的主要是軼聞趣事。聽說年逾七十的英國薩克斯大學教授羅伯特·查姆，讓中國同行親眼見識了他的人格魅力：他一心要推廣在第三世界國家做農村調查的各種經驗，用自己省下的課題經費為中國學者購書寄書；下鄉途中見到農民的糧車翻倒堵了路，他率先走下麪包車幫忙，這才帶動了中國學者們的臨場反應；他因為年紀大個子高，彎腰較吃力，所以時常「灑脫」地跪在中國鄉民面前問這問那，弄得他兩膝頭的褲子總是泥土色……。我和朋友談起這位老先生的種種，就止不住對照自己。我也有好心，曾經在鄉間路上的麪包車車廂裏動過念頭，想要照顧背孩子看病的

農村婦女上車坐，然而當時在心理上礙於怕周圍同事會有甚麼反應，結果就止於好心地想想而已，驗證了心理學上的——人多的場合難得做善事的理論？這樣地閒談下去，我們就說，人道之心、「紅十字」之心莫非在我們身上是不紮實的？

這樣就聊到了某些書本的理論，比如，「東西方文化的一個普遍的差別在於羞恥感和內疚上。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注意到內疚在西方文化發展上的作用，受其影響的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試圖研究羞恥感文化與內疚感文化的差異……中國社會被說成是以羞恥感取向的。」<sup>①</sup>類似說法還有「罪惡感文化」與「恥辱感文化」的二分法，如「……城市地區人格異常和神經症的一貫高發率。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把這種現象歸結為社會趨勢，即從在不發達國家表現得更為典型的『恥辱感』文化到與較發達的西方社會典型地聯繫在一起的『罪惡感』文化。」<sup>②</sup>

理論上的二分，歷來是難以操作



化的。但我和朋友，算是兩個「個案」吧，此時豈不是親身嘗試着心理學的內省和歸因過程？當然，不是所有的老外都那麼好，可是，他們接近中國農民時，怎麼表現得那麼自然、近乎「本能」呢？莫非是基督教文化的長期薰陶，在上帝之下人皆以「罪惡」而平等？而我們東方中國，實難去體味那一層形而上的罪惡。回想下鄉時我和朋友所感覺到的，不是那種很玄乎的個體「內疚感」，而確乎是中國人就社會交往層面而言的「羞恥感」，再具體不過的人際難堪——我們和農民，都難以擺脫有一方居高臨下的角色地位，似乎是習慣了二元結構的城鄉心態，習慣了行政級別制。我們再怎麼裝佯也還是醫生對病人式、幹部對群眾式、記者對土著式、或城裏人對鄉巴佬式的，於是認真得難免嚴肅地詢問農民：你們夫婦的性生活協不協調啊？……衛生條件怎麼樣呢？……

現在有了這樣的反省，也就說明我們也開始「內疚」了，這作為某種趨勢的、城市文明和城市病的內疚，以

住定在城裏而又嚮望着逃出去去的中國知識分子為甚（我們去把鄉村風光和民風誇張為道德主義的各種象徵，其實也正是自己的人格逃遁的明證）。因為住在城裏的我們，人格壓力的代價是非常沉重的。據國內一位學者的研究<sup>③</sup>，現代都市社會的居民，其精神壓力來自：（1）環境：高密度人口、噪音、污染及社會秩序等；（2）精神：人際競爭、人情冷漠、關係應酬等；（3）生活事件：例如擁擠之下心煩意亂，公共車上爭吵一觸即發，斗室之內，再怎麼深沉的形而上學時刻，也得與家人、家務相廝守。除此以外，由於許多中國同胞還不善於覺察或理解一般的心理病理現象，往往就把從環境和人際壓力中得來的情緒失調症狀（如緊張、焦慮、多疑、抑鬱等），轉移到身體反應方面去。在醫院往往由自己主訴或被診斷為「神經衰弱」，在傳統習慣上被看作「體虛」、「腎虧」，求助於看中醫吃補藥。這種現象被稱為「中國人的抑鬱症症狀軀體化傾向」，認為它「同我國傳統文化壓

制人們體驗與表達感情的慾望直接相關」④。

接下去我和朋友繼續吹牛，不求實證地猜測說，當然中草藥有的是，但莫非工作狂的、病的、忙的、報導得多的中年知識分子們，都應該去看心理醫生？算了，我們還是說自己吧。朋友說他在都市的人海中，有過馬爾薩斯式的狠心的「人口控制」意念。我調侃他說，著名的埃森克心理量表中有有一項要測驗的，就是問「你是否有過這樣的感覺：真心想要殺死一個人？」他聽着就笑了，這一笑就無疑問了。我這位朋友是比一般的善還要善心的人，所以才敢說出自己的「罪惡」。所以他至今還為怎樣對待街頭的乞丐而苦惱，是像從前每見一個都給錢，還是像現在，有時恨不得踢人一腳刺激起人的尊嚴！他的語言是敏感型的，後來聽我說，我「年輕時代」有一段日子專擠公共車，搶佔座位，為的是再讓座，而讓座為的是「做給社會風氣看看」——這回也就輪到他笑我了，笑我那真是年輕人才特有的「戲劇化動機」。我同意，為了本該平平常常的善心而刻意追求戲劇化效果，結果也還是個不自然！

可見，我們的人道之心並不紮實，哪怕我們真誠地從事着「紅十字」事業，我們的人格矛盾也在農民面前像日常生活一樣地露出破綻來。

牛吹完了最後就想到，吹牛是不解決問題的。顯然國際國內的研究界都以冷靜、客觀的實證為主流，那麼讓我們設計一項新課題，就叫「研究人員的文化—人格測量」。方法是把那些帶有解釋性定義的、寬泛的概念，如人道主義、紅十字精神、內疚感文化、羞恥感文化、罪惡感文化、恥辱感文化……統統都放到理論假設

的背景上去；而改用社會心理學中的愛德華斯個人愛好測驗量表(EPPS)中的項目，在我們周圍隨機選取實驗組和對照組，並且參照該項測驗在美國等地取得的常模數據，以及在香港、台灣等地取得的華人測驗結果⑤。假如我們的新測驗也能證實：相當部分的中國人，在人格的外傾心理或稱社會傾向的項目中，呈現出「慈善」動機或「責任感」的得分較高；然而在內傾心理或稱個人傾向的項目上，呈現出「交往」動機、「表現」動機等項的低分值，那麼，中國的一部分研究者，對於傳統輿論性、社會動員性或「職業道德」式的人道行為，顯得是完全能夠適應的。然而這種行為所需的來自個體需求穩定性的支持，卻可能是不足的，其具體結果之一就是，在陌生情境之下對待個體對象，表現出我們所經歷的那種遲鈍和不適應。這算是我們最終想要說明的。

#### 註釋

①⑤ M.H.邦德：《中國人的心理》，張世富等譯。

② A.J.馬爾塞拉等：《跨文化心理學》，蕭振遠等譯。

③ 夏國美：〈城市居民精神健康問題初探〉，《社會科學》，1991年1期。

④ 類似可參考的文獻如 A. Kleinman: *Social Origins of Distress and Disease*，其中提到中國人較少表達出當代世界性的抑鬱症狀，然而這卻須要聯繫到 somatization——心理症狀的軀體化來看待。

鄭凡 1953年生，現為雲南省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